

大学教师与知识分子

——兼论大学教师的专业化和学术自由

陈玉娟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

摘要:专业化高度发展的社会,给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及其学术自由的影响,包括工具性的压力和权威崇拜等等。大学教师要做的不是假装或否认这种冲击,而是正视并正确对待这种压力,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处理专业化和学术自由的关系。

关键词:大学教师;知识分子;学术自由;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G6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7)02-0154-03

一、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与专业化

“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从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13世纪起在大学里流行。它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把个人的思想天地同在教学中传播这种思想结合起来。^[1]所以,知识分子这个词从一开始就和大学教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既传授知识,也传播思想。在中世纪,众多的知识分子将这两种身份结合得天衣无缝,他们既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的著名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受到广大学生欢迎的教授,阿贝拉尔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知识分子并没有站在中世纪的舞台中央太久,他们的消亡没有太多外因的暗算:知识变成占有财富,变成权力的工具,不复再是无私的追求,知识分子加入了特权阶级,走向了贵族化的道路,可以说是他们自己献身于这种毁灭和死亡。在他们之后出现在文化领域最前列的人文主义者只不过是给他们衰落的前辈最后一击。正如雅克·勒戈夫所说:“虽然可以肯定,科学归属于政治,但如果学者最后作为政治家结束自己的生涯,很少会有好结果。”^{[1]106}当知识分子成了主教、副主教、教会机构成员、顾问和部长,他们的道路也走到了尽头。不过从中却可以看出,大学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个独特领地是源远流长的。

二战后,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大学和学院新建和扩大规模的运动,知识分子为了一个稳定的事业而放弃不稳定的生活,又重新大量涌进了大

学校园。按照拉塞尔·雅各比的说法,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都从城市进入校园,从咖啡屋进入自助食堂。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美国,只是作为二战后经济文化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这种趋势体现得更为明显。知识分子经过几个世纪的奋斗之后,又重新在大学找到了最佳的安身立命之处。他们在大学获得的有利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固定的收入、安稳的教学工作、漫长的寒暑假休息时间,这些对于曾经流离失所混迹于咖啡屋自命清高却不得不面对生活困境的知识分子都有着致命的诱惑。这些表面却实惠的好处使得知识分子有点欣喜若狂,以致于大多数人没有看到,这种好处背后不怎么引人注目却是真正决定性的问题,那就是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致的战后世界,学院系科里的知识分子成为了真正的专家,成为了真正专业化的群体。问题的关键在于知识分子离开了大众,离开了公共话语世界。专业化和现代大学知识分子实现学术自由成了最大的矛盾。

没有人会反对专业化,而且专业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早在韦伯的时代,他就提出“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2](P23)}可见,学术和大学教师的专业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不可逆转并不表示不存在隐患,许多

收稿日期:2006-09-11

作者简介:陈玉娟(1981-),女,浙江庆元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外国教育史。

的批评家或知识分子本身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爱德华·W·萨义德就认为,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特别的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直接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事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所谓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sm,也可译为职业化)^{[3]65}。大学教师的职业削弱了学术自由,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问题的确存在。

二、专业化的工具性压力

20世纪60年代早期,克拉克·克尔提出了“多科大学”的概念。在他的论述中,大学必须满足社会各项政策发展的需要,反映那些决定较大的社会发展方面的利益,除了那些有强加物质利益的“必要性”所规定的目标以外,多科大学已没有义务承担任何理想或目标了。换言之,它现在只是一个具有国家目的重要工具,一个知识工厂。在大学里,人们成为了一种可操作的对象,而对知识的追求也变成了学科的职业需求。可以进一步说:现代大学是国家——公司教育管理的所在地,它管理和控制了知识的生产。显然,充斥在社会各个领域里的实证主义世界观延伸到了学术领域,学术公正领域无可避免地被殖民化了,人们坚持用量化的标准来审核和评价知识分子的工作。与职位、升迁、奖学金和出版有关的决定一般都得到严格的实证主义标准的指导,包括统计熟练性和计算机编程技术的证据,缺乏量化的学术工作受到杂志编辑、手稿评阅人、学位委员会、经理人和基金委托人的质疑。拒绝实证主义标准的大学教师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学术威望和学术生涯受到致命的创伤,即使他们的工作是多样化的、可见的,能从学生和普通群众那里获得尊敬。^{[4]139}

出于这样一种可操作性的需要,现代大学在与之相关的巨大体系内建立了一个范式,或者是一个准则,这种准则只有身处其中的内行才懂得,学术领域被分解和专业化至极端。结果是相互分离、各不相关的学科和亚学科的大量繁殖。它们是科层化的,这一网络拥有自己狭隘的主题、行话和社会集团。今天在教育体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我们说某一个人是一名历史学家,只是相对于我们自己所熟知的学术圈子或内行而言的,外界并不知道这样一名历史学家的存在,甚至于不同学科领域的人也不知道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在这种环境中,大学教师的主体意识也就被剥夺了,他们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机器工具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更像一个官僚或者以官僚的咨询团的身份和出发点来思考和解决问题。而大多数知识分子们面对这样一种分裂的环境,经常不知所措或迷失方向,最后都退缩到了自己所谓的专业之内,然后使专业化更加登峰造极。学术研究首先被考虑的是一种功利性的目的,能否获得上司或专业委员会的认可成为了首要问题,研究本身的意义也不再是最终目的。这是知识分子集体学术自由的缺失。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种对专业化的妥协导致了雅格比所说的公共话语或者公众话语权的消失。知识分子相对于勇于面对现实、关注社会、对公众说话的前辈而言,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专业发展,对于社会、公众以及世界的普遍的利益而言,他们没有一种天生的责任意识。事业的成功取决于给院长和同仁留下的印象,他们对一个教师在学术圈内是否胜任要比对他在圈外,也就是在广大社会生活中的情况更感兴趣。他们从智能宽广的领域退回到了狭小的学科。专业化已经成为了一个避难所,它的私有性或垄断性大大地挫败了学术自由,当学术自由屈从于专业化时,学术自由便成了纯粹的空谈。

三、对合格专家和专业知识的崇拜

现代的学术环境在教授和研究生之间、专家和向专业人士前进的学生之间,形成了一种异化了的工具性的关系。要想成功,智慧与贡献都不重要,因为两者和职业都没有很大的关系。就如韦伯所说,在选才的过程中,才干并不是主要的因素,重要的是机遇和关系;重要的是是否“出身名门”或者和权威专家的关系。对美国教授的一次调查清楚地说明,“一个人最终学位的高低和毕业时的导师是谁比其学术成就更重要,更易获得学校里的好职位”。专业上的成就也不能改变而只会加剧这一不平衡,起初的成就保证了后来的成功。“开始时获得的好职位只是靠名望所起的作用,并不是靠表现出来的能力,而后来的职位就由最初职位的名望高低所决定。”在大学里的成功取决于“任职学校的声望和知名度”,或者是“关系人的地位和权力”,或者是“取得博士学位的学校的声望”,而不是取决于“发表的学术著作的质量和数量”^{[5]127}。大学教师要升职称,最终要获得一个职位,关键要得到同行的赞同和承认。

然而,美国前芝加哥大学的校长R.赫钦斯为大学下过这样的界说:“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它们必须是批判的中心。”但在现代大学,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研究生对导师的依赖和追随的心态,这种心态与批判性或独创性思维是截然相反的,这种心态以谨慎和服从为特征。研究生们为了寻求加入到专业化领域的途径,成为学科内的合法成员,他们会选择一条最为便捷也是最为有效的途径:对学术明星导师的追随,与之建立良好的研究关系。结果就是众多的追随者与导师建立了一种特定的知识流派,这种知识流派与其他学科或同一学科内的不同流派是相区分,甚至是相对立的。博格斯认为在极端的情况下,跟随者可能变成模仿者,他们的整体身份与学术明星的个性和贡献有密切关系。而问题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过于专业化、竞争性和依赖关系的封闭世界削弱了大学内广泛的批判性亚文化的形成。^{[4]144} 尊师重道确实是一种优良的美德,但“吾爱吾师,更爱真理”才是学术研究或大学独立存在的精神。追随甚至模仿是对大学精神的一种亵渎,也是对知识分子自己身份的另一种否定。

在专业知识方面,引文、脚注、索引不仅是兜售了某个领域内有影响力的一些学者的科学著作的普遍方法,也是初入学术网络的年轻学者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并与成功学术人物建立良好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它也被用作职位晋升或获取奖赏的指南。总的来说,对某个教授引用得越多,则其地位就越高。对某个人引用得多,则表明他或者她很重要。相反,引用得少,或者根本无人引用则说明某人无知名度,毫不重要。像任何对名声量化的研究一样,这一索引是流通的。它衡量的不是成果的质量,而是影响力和关系。^{[5][129]}与对学术明星人物的崇拜一样,对专业人物知识的崇拜也会导致学术发展的批判性的消失,科学和学术都是在不断地发展,传承只是一种,真理只有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超越中才能不断进步,专业知识如果长时间被奉为经典和神明,也就说明了长时间都没有更加进步和科学的学术研究。严格来说,我们每一代人都是无法达到真理的,只有通过世世代代的人长时间不断地努力和奋斗才能一步步接近真理。所以,对某一学术研究和专业知识长时间地崇拜都会导致学术研究的停滞不前。这种对专业知识的推崇和对合格专家的崇拜都会妨碍学术研究的理性自由,大大限制了学术的自由发展。

四、学院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

面对专业化的压力,批评家或知识分子本身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福柯到萨义德一代代的学者,都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应对的方式。普遍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对待专业化压力的冲击问题,其方式不是假装那些冲击不存在或否认他们的影响力,而是重新认识知识分子的位置和责任问题。作为最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萨义德对待这个问题和20世纪30年代的马哈姆的观点是类似的。马哈姆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疏离社会的知识阶层,应该不依附于主流。萨义德也认为对抗专业化最好的方式就是业余性,业余性相对于专业化来说就是要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

但对于不可抗拒的专业化趋势,是否用简单的业余性就能够解决呢?毕竟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如萨义德游离于主流之外,成为一个他所谓的“流亡者”。对于众多已经身处学院之中的知识分子而言,美国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的科学精神,应该是解决专业化和学术自由的更好的方式。那就是: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普遍主义在学术专业化的问题中,也就是萨义德的普遍性,超越既定的背景、国籍、语言、民族,以及由此形成的特定的思维模式,而最重要的就是超越专业的背景 and 知识,从学术研究和人类利益的普遍性

出发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公有主义指学术研究是社会各界共同协作的结果,成果的发表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专业学术领域,以晦涩的学术论文来表现研究的成果对于公众来说是不公平的,知识分子要做的不仅是要将成果告知同行,更重要的是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将一个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现状展现给公众。无私原则指的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为了研究而研究。学术自由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知识和学科的发展,不应该有其他任何的私人利益和动机妨碍这个目的的实现。任何出于职业的利益和目的,而讨好专业委员会和吹捧同行的行为,对于学科的发展都是有害的,也不利于专业化本身的发展。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对于解决专业化的极端发展则更具有针对性,学术研究应该和科学一样不承认偶像,不盲从于权威,只相信事实和真理,学术研究和学术自由都是天生的反对权威主义者。在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的指导下,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以独立的精神对待专业知识和合格专家,学术明星的思想、观点都有被同行怀疑和检验的必要。“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早在唐朝的韩愈就已发出过这样的呼声,可悲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看到的还是前赴后继的追逐名师的潮流。这是对学术自由和专业化发展的一种伤害。

专业化本身并没有问题,它是学科发展的一种必要,它和学术自由没有本质上的冲突。问题在于,在专业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专业的理解只集中于职业的发展或对学科分裂本身,而没有更好地认识到学科健康发展的专业化需求。一味地指责专业化的缺陷,而不是认真地考虑专业化发展和学术自由的契合点,这对于学科的发展和维护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本身都没有任何意义。只要我们正确对待专业化和学术自由的关系,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来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学术自由和专业化都是可能的。

参考文献:

- [1][法]雅克·勒戈夫.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 张弘,译. 卫茂平,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德]马克思·韦伯. 学术与政治 韦伯的两篇演说[M]. 冯克利,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5.
- [3][美]爱德华·W·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译. 陆建德,校. 北京:三联书店,2002.
- [4][美]卡尔·博格斯. 知识分子与现代性危机[M]. 李俊,蔡海榕,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 [5][美]拉塞尔·雅各比. 最后的知识分子[M]. 洪洁,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刘正花

